

變動中的勞動市場： 論台灣低度就業之現況

黃冠穎、游玉卿、李孟壕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摘要

資訊與技術的革命，不但造成了生產及工作的改變，與經濟全球化的事實，亦引領著世界進入了資訊社會的時代。許多學者論述，資訊社會將導致全球經濟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不相稱，亦會造成勞動力市場的技能以及薪資的極化，女性的工作的機會與待遇將更加惡化，甚至被視為產業後備軍的角色。研究發現，台灣在進入資訊社會的當下，與先進國家有類似的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消長關係。在製造業部份，初級與傳統製造業大量外移，呈現另類“產業升級”狀態；服務業中也大量增加了低技能屬性的工作；而女性在資訊社會中的就業狀況亦沒有改善，不平等的結構則是更加的強化。

關鍵字：資訊社會、勞動市場、低度就業

壹、前言

自工業革命延續至今的大量生產經濟模式，在 1970 年代遇到了市場規模的瓶頸，為了維持其經濟模式的持續運作及穩定，需要更有大規模的市場的支持，全球化市場於是應運而生，也造成了經濟全球化的出現（Castells，1996）。

近年來，經濟的全球化改變了原有的生產運作規則，使得全球化分工得以實現。「台灣」一直是個以出口導向生產及貿易為主的國家，與世界主要經濟市場的連結及互動十分密切，緊密的鑲嵌於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中。這種密切的連結與鑲嵌關係，亦可以從產業結構的變動模式上窺見一二。從台灣與世界主要經濟市場（此以美國與 OECD 國家為例）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來說，台灣製造業 GDP 佔全國 GDP 的比率，自 1981 年的 35.6% 降低到 1998 年的 27.1%；這樣的趨勢與美國的趨勢相同（自 1980 年的 22% 降低到 1998 年的 18%）。在服務業方面，台灣是由 1981 年的 47.2% 升高到 1998 年的 63.2%；而美國則是由 1980 年的 64% 升高到 1998 年的 71%。失業率的變動趨勢方面，亦可以發現台灣與 OECD 國家有相近的持續成長趨勢。由此可見，台灣的產業結構變化與勞動力市場變化的確與世界主要市場緊密的連結著。

目前，世界各國皆受到資訊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等生產典範轉移的影響，使得市場、工作與勞動開始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部份學者認為資訊社會中的經濟典範移轉，將帶給當代人們更有彈性、效率、專業分工以及知識經濟導向的工作與勞動模式。但是，更有學者發現，資訊社會的資訊技術革命帶來了包括市場的全球化、工作的片段化、勞動的去技能化這些對工作與勞動而言，極為重要的改變。這些變化，導致了經濟市場與勞動力市場不相稱、勞動市場極化以及女性就業區隔化等勞動力市場結構性轉變，並且具象的表現成為現代資訊社會中普遍發生且日益嚴重的失業及低度就業的狀況。而這樣的社會變遷戲碼，也正開始在台灣上演。

在進入資訊社會的同時，台灣亦面臨資訊社會伴隨而來的工作與

勞動衝擊；這樣的衝擊將嚴重地影響著台灣的產業結構與勞工就業狀況。所以本研究嘗試從台灣近年來的勞工就業市場變化狀況，以瞭解台灣進入資訊社會後，對勞動力市場之衝擊與改變。傳統上，對於勞動力市場的研究重心，都放在顯性的整體勞動參與率與失業人口的變化，對於相對隱性的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的變化則較不注意；雖說過去的低度就業情況並不嚴重，但它卻是資訊社會時代的勞動力市場會遭遇到的重要結構性問題，對社會的衝擊與影響也會持續增加。所以本研究將透過全球經濟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不相稱、勞動市場極化、女性就業區隔化等討論，進而觀察國內低度就業的狀況。

貳、文獻探討

一、全球經濟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不相稱

當代資本主義運作的最重要變化就是「經濟全球化」。在過去，資本主義的市場極大化運作，是受到地域疆界及時間的重重限制；但在當下，資訊科技的發展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使得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與思考邏輯跳脫過去受時空限制的窘境，倍增了其運作的規模及速度，對人類產生了既深遠又變化迅速的全新影響。

在全球自由市場的概念之下，為了要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益（資本主義運作原則），跨國企業在資訊科技的輔助之下，建構出全球生產鏈及全球勞動市場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實現，無非是要承續資本主義的全球運作邏輯，達到提高生產效益、增加競爭力以及降低生產成本的目的；而它們都是源自於全球分工的想法，植基於資訊科技所造成的生產及管理的改變。在全球生產鏈方面，由於主要工業國家意欲造就全球市場，因而積極推動自由市場的形成。故各國對於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的限制及防堵逐漸降低或消失，使得跨國企業得以自由選擇最佳的投資環境、勞動力資源以及生產條件；以最能獲益的方式，將生產的各階段流程及部門，進行全球分工生產的分配與定位，並結合資金操縱與在地勞動力，完成全球彈性分工的策略性操作。其操作原則為：讓商品能以獲取最大利益及最低成本的條件生產，並結

合資本及勞動力分開散佈在世界各地(Folker Frobel, Jurgen Heinrichs, Otto Kreye , 1980)。

除了全球分工之外，資訊科技的發展對整體經濟生產亦帶來深遠的影響。首先，資訊科技不僅能使得生產過程得以被最有效的分割，在管理及生產控制上也能使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得以被消弭。從生產者的角度而言，資訊科技使得生產過程得以配合全球分工的邏輯，不管是外包、兼職、電傳或是部份工時等工作形態，做最有經濟效益的全球彈性分工規劃，也能同時兼顧而控制與管理的品質及效率。於是乎，在追求最大利益與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的考量之下，臨時化工作(temporization of work)及工作不穩定的趨勢則會大幅增加。當工作本身變得片段、零碎，越來越像勞工一般可以被替換，就業的狀況也就會越來越不穩定，相較之下，勞工的就業機會及福利保障的品質也就會日漸低落(Castells , 1996 ; Webster , 1996)。

為了達到全球生產鏈的目的，必須仰賴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配合；它將全球的總體勞動力都視為其潛在運用的勞動供應單位，依其生產所需的勞動力數量、特質、勞動力品質及勞動成本，作最有效率及最符合經濟成本效益的全球性分配。全球分工的作法，雖然可以讓跨國企業選擇最佳的投資環境、運用大量最為低廉的勞動力、獲取最有利的生產條件；卻會對在全球生產鏈中各國原本的產業結構造成影響(包括跨國企業的宗主國及鑲嵌在生產過程中的各個國家)。簡單的來說，在全球生產鏈中所有國家的原有勞動力市場，會因為與全球生產鏈相扣連所造成的產業結構變化，產生無法相配合(mismatch)的狀況。這樣不斷與不同全球生產鏈相扣連的動作，將使得國家原有相對穩定的產業結構進入一種極端不穩定的狀態。相應而生的結果，將導致勞動力市場的供需更加紊亂，失業與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¹的狀況也會日趨嚴重。

¹ 依據主計處對於低度就業的定義，就業者的低度就業情形共分「工時不足」、「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等三種類型。工時不足者係指工作時數低於正常情形，而希望增加工作時數者；所得偏低者意指工作時數已足夠，但所得卻偏低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者是指具較高之技術與水準，而擔任較低職務者。

二、勞動力市場的極化

Esping-Andersen (1999) 認為，全球貿易競爭是大國才玩得起的遊戲，新的市場加入者只能以降低薪資的策略來加入戰局。在勞動力全球化競爭的條件下，先進國家的勞力密集產業會基於勞動成本的考量而傾向進行產業外移，將產業移至能夠提供大量廉價、容易替代、能獲取最長工時勞工的第三世界國家。先進國家的較低技能勞工將遭遇與第三世界低價勞動力競爭的窘境。隨著在先進國家大量生產階段的那些低技能組裝工作不斷消失（OECD 國家的製造業在 1979-1993 年間就流失了 22% 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新近產生的工作機會幾乎都落在服務業裡。而服務業內新增的工作性質，則是以低技能需求（low-skilled）的服務性工作為主。在製造業與服務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可能性部份，雖說當前新興增加的工作幾乎都落在服務業中，但是卻幾乎無法吸收原先因為產業結構變動所剩餘的製造業勞動力。舉例來說，新增加的商業與醫療照護部份的服務工作，是屬於需要技術密集的工作類型；再者，在勞動密集的服務性工作部份，通常需要一些文化性的技能，而且這些工作通常都是女性導向的工作，所以無法與剩餘的製造業勞動力供給相配合，在流動上也顯得較為不可行。

在技術密集的製造業與服務業部份，在近年來的成長比例十分快速，但其在總體就業結構裡所佔的比例不高，其增加的工作數量也不多。故就總體而言，製造業及服務業所增加的就業機會分布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一端是以專業、技術密集的工作部門，另一端則是低技能、勞力密集的工作部門（Castells, 1996；Esping-Andersen, 1999）。這樣的工作技能需求的極化發展，是同時並存於當前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內的。Esping-Andersen 更進一步指出，在這種生產範型轉變的過程中，製造業的生產力成長還是會比服務業來的快。而這兩者之間的生產力差距（productivity gap）會造成「成本弊病」（cost disease）的問題。這樣的生產力差距會使得服務業勞動成本會被高估，因而造成：1. 勞動成本估算會向下修正，工作薪資會被縮減，以符合其實際生產力的表現；2. 如果服務業的薪資夠仍要維持與經濟發展相同的水準，則可能使得勞力密集、生產價值低、技能層次較低的服務業面臨

因為成本過高而喪失市場的風險；3.這種類型的服務業也有可能成為一種補助式的服務業（subsidized service），由國家直接補助產業生產，或是政府透過補貼消費者的方式來刺激該類服務的消費。

此外，Castells（1988）也指出，1980 年左右所新增的工作中，有幾近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屬於低技能需求及低薪資的工作。也就是說，整體的職業結構中，增加的大部分多落在最下層的部份，相對的，原有中層的就業機會便會移至最下層，而上層的增加又相較為少。這樣的職業結構的兩極化現象，會導致收入極化現象。再者，近年來由於整體勞動力的教育水準普遍提升，相較於這樣技能求與就業結構及收入的極化現象，將勢必造成在收入、學歷與工作上嚴重的不相稱（mismatch）狀況。而那些原先教育程度就較低的低技能勞動力，其就業機會便會因這樣的就業結構改變而更加減少與受到限制。

三、女性就業的區隔化

在此一全球性的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我們發現，不論女性是在何種開發程度的國家或行業別（在此僅指製造業及服務業）內，其在勞動力參與的比例上都有明顯的提升。在就業機會的增加方面，由於生產過程經過資訊科技及管理技術的改變，使得勞動者所需的生產技能水準降低。因此，在成本及管理的考量下，過去技術層次較低、經驗較少，但薪資水準也較為低的女性勞動力，便在此一產業勞動需求轉變的過程中，反而轉為主要的勞動力供給，這樣的狀況在大量引進自動化生產管理的製造部門尤為明顯（Webster，1996；Esping-Andersen，1999）。

但是，這些新增的工作在工作內容、工作條件及收入上，卻與過去的工作有相當的落差。以製造業來說，由於製造業勞動結構改變的主因是為了降低勞動成本，配合著資訊科技對生產過程及管理的改變，使得製造業的勞動力技能需求降低，產業得以採用技能與薪資需求皆較低的女性勞動力，用以替換必須支付較高勞動力成本的男性。所以女性在這裡扮演的是廉價、易管理、容易替換且數量龐大的產業後備軍的角色。在服務業方面，依據 Esping-Andersen（1999）的說法，新增大量的服務業工作會是屬於低技能需求的工作，而技術密集

的服務性工作只佔新增工作裡的一小部份而已。所以雖說女性在服務業裡佔了絕大多數的工作機會，但卻大部分都是不需要很多技能的工作。

Webster (1996) 認為，性別角色的不平等權力狀況，是會反應在工作上的。例如男性主要集中在需要較高技能的主要經濟部份，而女性則被集中在低技術的工作部份（因為在社會的價值期望中，對男性的技術與經驗要求仍是高於女性），而這樣的工作分配也將導致在收入的部份，女性通常會較男性為低。

資訊科技的進步與發展，同樣會對部份女性勞工造成工作及技能流失的衝擊，甚至使得女性勞動力被更加的邊陲化。由此可見，女性在這新一波的勞動力市場變化中，仍是居於劣勢，甚至有更加惡化的趨勢。

參、研究問題

台灣在經濟上一直是個以出口導向生產及貿易為主的國家，與世界主要經濟市場的連結及互動均十分密切；因此，我們的經濟發展腳步也承續著美國等高度開發國家的脈絡行走。近幾年來，在積極進入資訊社會的同時，台灣同樣也受到資訊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等生產典範轉移的影響，經濟與就業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所以本研究希冀透過全球經濟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不相稱、勞動市場極化以及女性就業區隔化的角度，觀察分析台灣進入資訊社會時所產生的低度就業狀況，並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1. Esping-Andersen 認為，近年來大量新增的服務業工作，將會幾乎是屬於低技能需求的工作，而技術密集的服務性工作只佔新增工作裡的一小部份而已。Castells 亦指出，由於成本的考量，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被不斷移至能夠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第三世界國家，加上工作已被資訊科技處理成零碎化的單元，使得生產所需的技能降低，勞工的被取代性增高。這些變動再加上製造業及服務業中產生技能的極化現象，使得我們可以預見到在製造業及服務業中的勞動

力供需上的不相稱。這些現象已經普遍在進入資訊社會的高度工業化國家中發生；在擁有類似發展前提的台灣，在製造業及服務業勞動力的技能、所得以及工時的供需上所造成的不相稱狀況將會是如何？

2. 由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在資訊社會下，服務業內的工作結構，正朝向技術極化的情況；而且服務業內大量增加的部份，皆是低技術需求屬性的工作。在這兩個條件雙重影響之下，國內不同技能屬性的服務行業，是否會有不同的低度就業狀況？

3. 傳統以來，性別的權力結構就一直持續延伸到工作的領域，直接反應在實際收入、技術性工作的取得機會以及相關的工作條件上，而使得性別在觀察勞動議題上，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部份學者樂觀的宣稱，資訊社會所帶來的科技與技術的進步，將會消弭性別之間原有的不平等狀態，但 Webster 指出，在資訊社會中，女性在工作收入的水準及高技能工作的取得上，仍會受到較不平等的待遇。因此，本研究將承續第一及第二個研究問題，進一步探究性別在服務業與製造業內，以及在服務業內不同技能屬性的服務行業內，其低度就業狀況是否有差異？

肆、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次級資料分析法，以行政院主計處 1980-2000 年（共 21 年）「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之「勞動力運用狀況」統計數據為主要分析資料來源；針對台灣地區勞動市場之低度就業 (underemployment) 狀況數據加以分析，期能看出台灣勞動市場中，低度就業在不同產業間以及不同性別的長期變動趨勢。

二、分析變項

本研究將觀察不同行業內、不同性別間的低度就業狀況。研究的變項共計三組：『行業』、『性別』與『低度就業』。

(一) 在低度就業部份，本研究依據主計處對於低度就業的定義，將就業者低度就業的情形分為：「工時不足」、「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等三種類型。所以『低度就業』內包含「工時不足」、「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這三個變項。

「工時不足」者，係指工作時數低於正常情形，且希望增加其工作時數者；「所得偏低」者，意指工作時數已足夠，但所得卻偏低者；「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者，是指具有較高之技術與水準，而擔任較低職務者。

(二) 在性別方面，分為男、女兩項。

(三) 在行業部份則是依據文獻部份的討論，僅觀察資訊社會中的製造業與服務業部份，包括了：

1. 製造業

2. 服務業：(1) 商業/批發零售與餐飲業

(2) 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

(3)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由於「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在這二十年間歷經幾次修訂¹，為符合本研究分析需求，故將某些行業合併計算，詳見註一。本文所稱之「服務業」為商業/批發零售與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及公共行政、社會服務與個人服務業等四項行業之統稱。

三、分析架構

¹1970-1996年稱為商業，1997年後更名為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1970-1992年為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1993年後區分為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及工商服務業等二行業。

1970-1983年為社會團體及個人服務業，1984年更名為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1993年後則區分為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及公共行政業等二行業。

為觀察不同行業內、不同性別間的低度就業狀況，本研究將把蒐集得到的次級資料，依據下述的排列組合順序進行比較、分析：

比較三種低度就業（工時不足、所得偏低、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佔總體低度就業的比例趨勢。

比較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總體低度就業狀況

比較製造業與服務業的三種低度就業狀況

比較服務業內各行業的總體低度就業狀況

比較服務業內各行業的三種低度就業狀況

比較性別在服務業與製造業內的總體低度就業及分項差異

比較性別在服務業內各行業的總體低度就業及分項差異

伍、研究結果

一、台灣地區低度就業整體趨勢

從 1980 年到 2000 年中，台灣地區勞動市場之低度就業人口在整體的就業人口所佔比例皆高於 15%；從 1980 年的 15.02% 一度上升到 1985 年的 25.66%，之後逐年下降至 1994 年的 16.48%，到 2000 年則又上升至 18.78%。其中，有很大比例的不適當就業人口集中在「所得偏低」、「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兩個項目中，相較之下，「工時不足」的比例是較低，而且變動的程度也較小。

在長期的發展趨勢上，我們發現，「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狀況雖然在 1992-1993 年間有大幅的下降，但 1993-2000 年則是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而「所得偏低」的部份雖有較多的波動，但大體上還呈現持續緩慢降低的狀況。

所以，總體來說，台灣的勞動力教育水準高於就業市場需求的狀況越來越嚴重，但所得偏低的狀況正在逐漸下降當中。故本研究將針對「所得偏低」及「教育與職業不相稱」這兩項台灣低度就業中較為

嚴重，變動程度也較大的類別進行深入探討。(圖三)

二、製造業與服務業之低度就業情況

觀察國內製造業與服務業總體低度就業的部分，我們發現服務業的總體低度就業比例一直是比製造業整體低度就業比例來的高；表示服務業整體的低度就業狀況一直是比製造業來的嚴重。

在變動趨勢方面，製造業總體的低度就業狀況自 1986 年起，一直呈現持續下滑的趨勢，直至 1996 年才又小幅回升，繼而逐漸持平到 2000 年。同樣的趨勢也出現在製造業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上(圖一、圖二)；進一步觀察後，發現製造業中就業比率大幅下滑的行業為：塑膠製品製造業、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及雜項工業製造業(圖七之一 三)，而這幾項行業行政院主計處對製造業所作的技術分類中，皆屬於勞力密集性的基礎及傳統製造業；所以整體的製造業應逐漸移轉到以技術密集為主的製造業。再配合(圖五)中，製造業的「教育與職業不對稱」越見成長，而「所得偏低」的比率越來越降低的狀況；故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台灣的製造業由於勞力密集行業所佔比例越來越低(可能是產業外移或是萎縮)，使得整體的製造業對於勞工技術要求的層次提高。雖說這樣的變動不能完全等同於產業升級的狀況，但是其最後結果卻是相同。也由於整體製造業所需勞工技能提升較高，但原有勞動力供應並不能及時追上技能提高的速度，所以在「教育與職業不對稱」部份的比例會持續上升；再者，「所得偏低」的部份也會因為整體技能需求較高而減少其薪資落差的比例。

服務業部份的總體低度就業狀況則是自 1980 年起，持續大幅上升，直到 1992 年開始急劇下降，1994 年-2000 年則是持續上升。承續觀察製造業的做法，我們發現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及就業結構比例，都處於急劇的上升狀態中(圖一、圖二)。進一步觀察後，發現服務業增長得最大部分為商業(圖八)；且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行業分類表，我們可以得知商業大部分是屬於低技能需求的勞力密集型行業。由於服務業大幅增長的就業機會，幾乎都屬於低技能需求的勞力密集工作；所以在「教育與職業不對稱」上會隨著此類就業數目的增加而

持續成長。在「所得偏低」部份，由於是低技能的勞力密集型工作，許多產業後備軍（女性及年青人）得以輕易進入此一就業市場參與競爭，所以自然很容易造成勞動力供應過剩的狀況，而由於供需的變化，使得企業得以輕易壓低薪資，自然「所得偏低」的比例也就會隨著持續上升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何 1994 年至 2000 年間，服務業在「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對稱」的低度就業比例都逐漸上升的現象（圖六）。

三、服務業內各行業低度就業情況

比較服務業內各行業的整體低度就業狀況(圖九)後，發現服務業內各行業中，低度就業最嚴重且變動劇烈的行業為：商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和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這兩個行業；至於其他的行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中低度就業所佔的比例實在太低，而且歷年來的變動程度都不大。所以本研究將針對低度就業程度最嚴重且變動劇烈的商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和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這兩個行業做更深入的分析。

觀察（圖十）後，我們發現大致上，商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和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這兩個行業在「教育與職業不對稱」及「收入偏低」的歷年比例趨勢上，有著雷同的變化趨勢。較為有趣的發現是這兩個行業在「教育與職業不對稱」及「收入偏低」的比例高低順序上恰好相反；商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的「教育與職業不對稱」比例高於「收入偏低」，而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則是「收入偏低」的嚴重程度高於「教育與職業不對稱」。這是因為行業結構的不同所導致的結果；以商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來說，業內的工作是集中在低技能需求的勞力密集部份，所以在「教育與職業不對稱」的嚴重程度上會高於「收入偏低」。而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中的工作屬性與需求就不太一樣，通常要進入此一行業都必須伴隨著某些資格或是限制，但換句話來說，在此一行業裡，被替換的機率並不高，所以「收入偏低」的嚴重程度就會超過「教育與職業不對稱」。

四、性別在各產業內低度就業情況

(一) 產業間的差異

從(圖十一)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整體的趨勢上，性別在低度就業(不論是在製造業或是服務業)的趨勢上，其變化都很雷同。在製造業中，女性的低度就業狀況較男性嚴重；因為製造業的工作性質不是技術密集就是要耗費大量體力的勞力密集部份，以傳統來說，大部分還是以男性的勞動力為主。但晚近由於科技及資訊技術的革命，使得進入製造業所需的技術門檻降低，體力性或危險性的工作也逐漸被自動或機器所取代，也因此女性在製造業裡，常被企業視為是替換原本男性技術勞工的廉價產業後備軍。所以女性在製造業裡的低度就業狀況會比男性來的嚴重的多。

資料顯示，在服務業中則是男性的低度就業狀況較為嚴重。由於女性本來就在服務業中佔有相當的比例，加上服務業中的文化及技能限制，使得男性較不容易進入。故在服務業中，男性的低度就業狀況會較女性來的嚴重；但是，在嚴重性的差異上卻有所不同；在製造業裡，女性跟男性低度就業程度的差異，大於在服務業裡，男性跟女性低度就業程度的差異。這樣的狀況或許是由於性別角色權力在工作場域中又重製了一次的的原因，男性不管在何種行業裡，還是較女性有更多的機會取得較技術性的工作，即使是再以女性為主的服務業中，依然是如此，只是嚴重程度會比以男性為主的製造業稍微輕微一些。

(二) 產業間不同低度就業類型的差異

製造業中的女性低度就業類型，以「所得偏低」所佔比例較高，然而，在1997年後，「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比例已高於「所得偏低」，且呈現逐年上揚的趨勢，顯示在製造業中，女性低度就業類型除「所得偏低」外，「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影響力漸升。而男性在此產業中的低度就業類型中以「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為主要影響類別(圖十二)。這樣的數據變化仍是呼應著製造業產業轉便為技術密集產業的結構性變化假設以及製造業轉型前，女性仍扮演產業後備軍的假設。女性在製造業轉型之前，「所得偏低」的狀況始終較「教育與職

業不相稱」的情況來的嚴重，直到產業形態轉變為技術密集時，才呈現與男性相同的模式：「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比例持續上升，「所得偏低」持續下降。而男性則是一直保持「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比例高於「所得偏低」的狀況，但也因為產業結構的改變，而在 1993 年後逐年加大兩者間的差距。

在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女性低度就業類型中以「所得偏低」的比例較高，且變動的趨勢與服務業中女性整體低度就業的變動走向相符合，顯示「所得偏低」為服務業中女性低度就業的主要類型。而男性在服務業中的低度就業類型明顯以「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為主(圖十三)。從上述服務業就業是以商業佔最大宗，以及商業是屬於勞力密集的低技術性工作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以女性為主的服務業裡，女性由於進入服務業的門檻較低，所以在此扮著產業後備軍的角色，所以「所得偏低」會較「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來的嚴重；這樣的狀況在 1993 年後尤為嚴重，這二者在女性低度就業的比例是同時上升的。雖說男性在 1994 年後，「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低度就業比例也同時升高，但是仍維持著「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狀況較「所得偏低」嚴重的模式。這代表著男性在服務業裡雖有「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狀況，但在收入上仍相對優於同條件的女性。

故整體看來，無論在製造業或服務業中，男性的低度就業情形主要發生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上；而女性雖在 1997 年後「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影響加深，但長期看來仍以「所得偏低」為其主要低度就業問題。

(三) 性別在服務業各行業中的低度就業狀況

觀察服務業中二個低度就業較明顯的行業後發現，在商業/批發零售餐飲業中，男性的低度就業主要仍發生「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情形；而女性則以 1992 年為一分界點，1992 年之前「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所佔比例互有高低，但在「所得偏低」部份還是稍嚴重一些，1992 年之後則以所得偏低的情形較為明顯。(圖十四) 在公共行政、社會服務與個人服務業中，女性的低度就業狀況是以「所

得偏低」較為嚴重，雖在 1992 年以前「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所佔比例差距不大，但在 1992 年之後明顯可以看出，「所得偏低」為女性在此行業中的主要低度就業情形。而男性在此行業中並看不出「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兩者有太大的差異。若以「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來看，男女之間的差異並不明顯；在「所得偏低」部份，我們則可見到女性較男性在這部份的低度就業狀況來的嚴重。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在任何行業中，男性與女性在三種不同低度就業的嚴重比例順序，幾乎皆有一致的模式產生：男性是「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最高，其次是「所得偏低」，最後才是「工時不足」；女性則是「所得偏低」最高，其次才是「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最後是「工時不足」的部份。

陸、結論

從整體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在進入資訊社會之時，台灣的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勞動力市場，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以製造業來說，製造業的產業結構在 1986 年起開始發生變化，傳統基礎的勞力密集型製造業逐漸從台灣消失或是萎縮，使得製造業產生了一種結果類似產業升級的結構性變化，製造業整體就業市場所需的技術層級提高，也造成了與過去不同的低度就業狀況：「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比例逐年提高，而「所得偏低」的比例則是逐年降低。服務業方面則是因為商業部份大量急增擴張，新增的工作類型又是以低技能的勞力密集形態為主，所以也造成產業後備軍的加入，使得「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問題同時日益惡化。

在不同技能屬性的服務業中，我們發現會有不同的低度就業狀況，在以低技能需求、勞力密集工作形態為主的商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中，會有較嚴重「教育與職業不對稱」的低度就業問題；而具有進入門檻限制、被取代性不高、以勞力密集性質為主的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則是在「收入偏低」這部份的低度就業問題上，會有較嚴重的狀況。顯示出不同技能或工作屬性的行業，是會對應出不同的低度就業問題。

在性別方面，總體來說，女性勞動力依然是被視為男性勞動力的替代或附庸，驗證了 Webster 認為，在資訊社會中，性別權力結構仍然會複製到工作場域的想法。所以女性的三種低度就業問題順序會是「所得偏低」、「教育與職業不對稱」以及「工時不足」；而男性則是「教育與職業不對稱」、「所得偏低」最後才是「工時不足」。再者，女性通常被視為產業後備軍，用來作為填補大量低技能需求、勞力密集的新興服務業人力的不足。一般來說，這些對女性勞動力不公平的勞動市場邏輯，是貫穿所有屬性的行業的，不會因為行業的屬性不同而有所差異；這樣的普遍性可以在本次研究的分析中觀察到。所以台灣女性在資訊社會中，仍舊是一群不被公平對待的勞動族群。

從台灣低度就業的歷年狀況分析，我們發現台灣在進入資訊社會的現在與未來，的確充滿著許多可預見的結構性難題：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勞動力素質與就業市場需求的不相稱，以及工作上性別機會與待遇不平等的狀況。這些日益嚴重的資訊社會新問題，嚴重的影響著我們的經濟發展及未來，在我們期待著資訊社會可能的未來美好遠景之前，應該投注更多的關心在進入資訊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參考書目

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

Folker Frobel, Jurgen Heinrichs, Otto Kreye (1980) ,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World Economy," pp.256-273 in book, J. Timmons Roberts & Amy Hite(eds.)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UK : Oxford.

Castells, M(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Massachusetts : Blackw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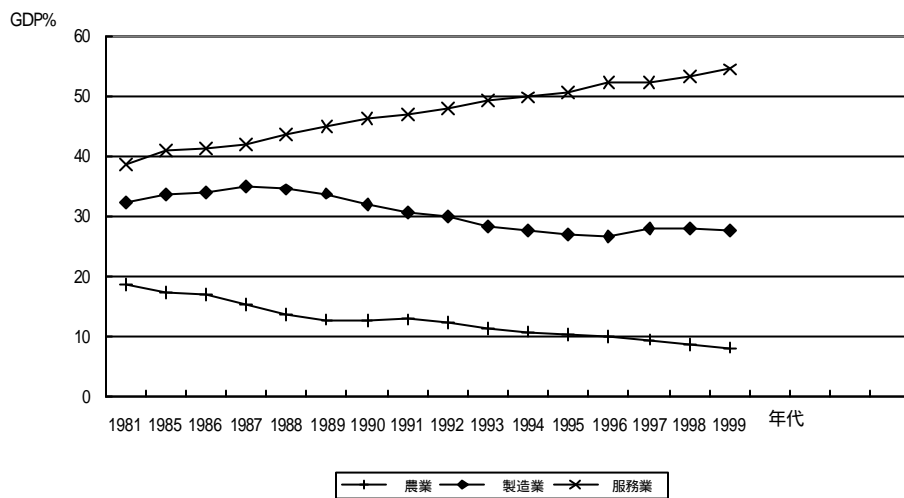
Castells, M. (1988)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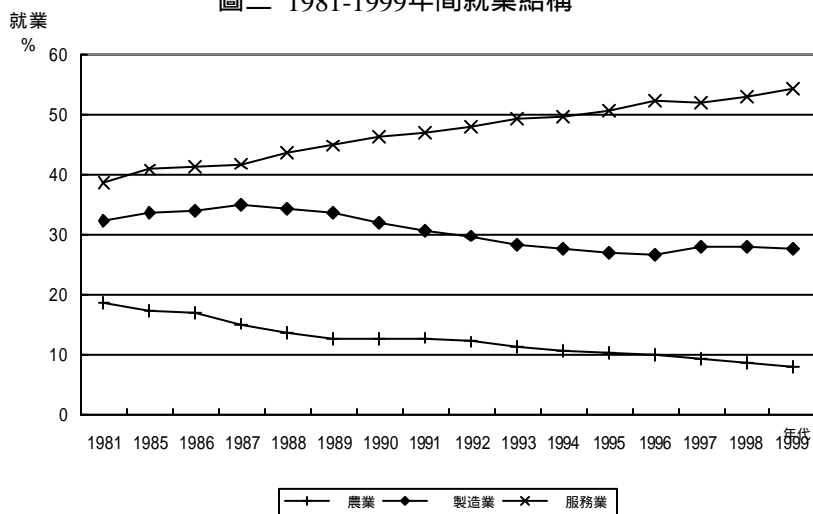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ster, J. (1996) *Shaping Women's Work: Gender, Employ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Publishing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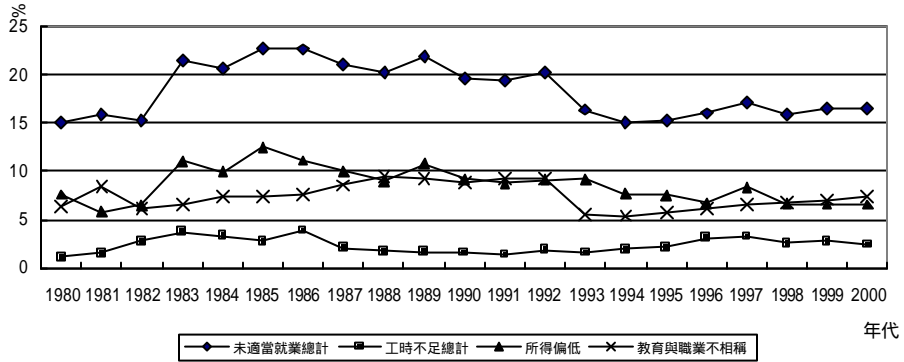
圖一 1981-1999年間台灣產業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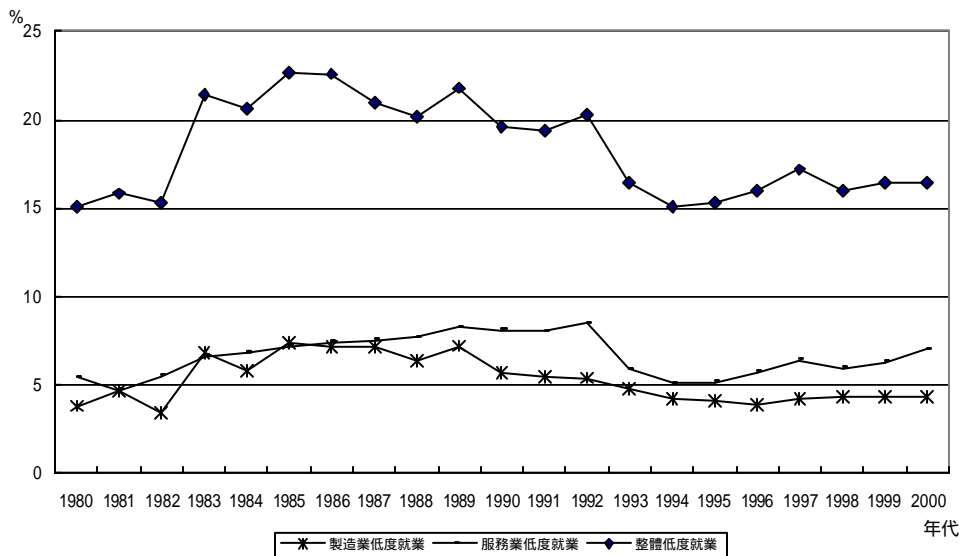
圖二 1981-1999年間就業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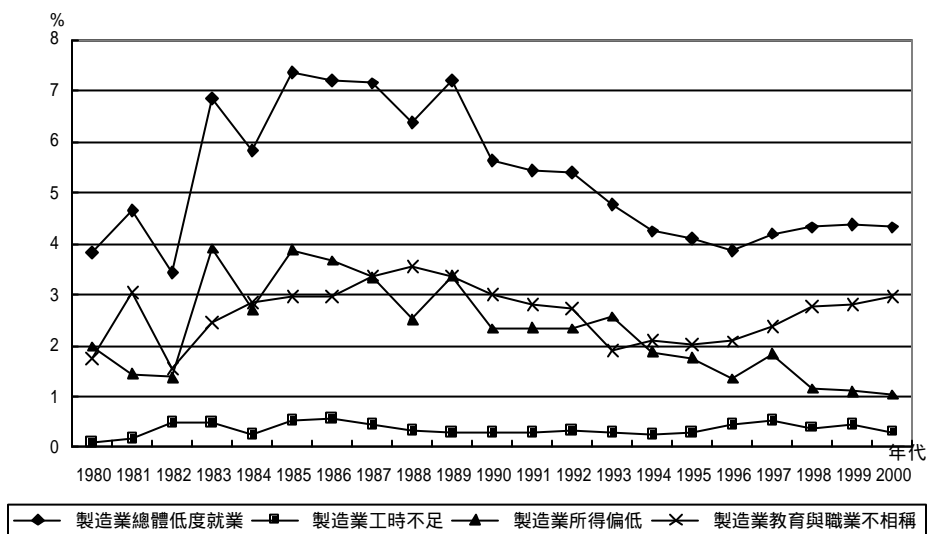
圖三 台灣地區整體低度就業變動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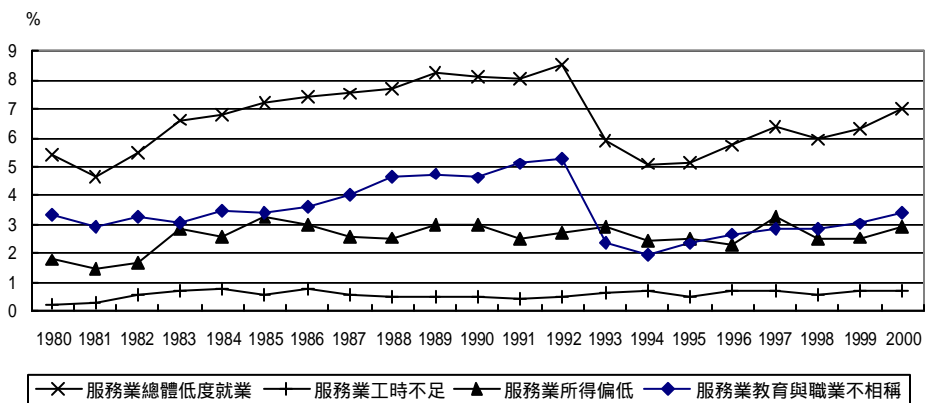
圖四 不同產業之低度就業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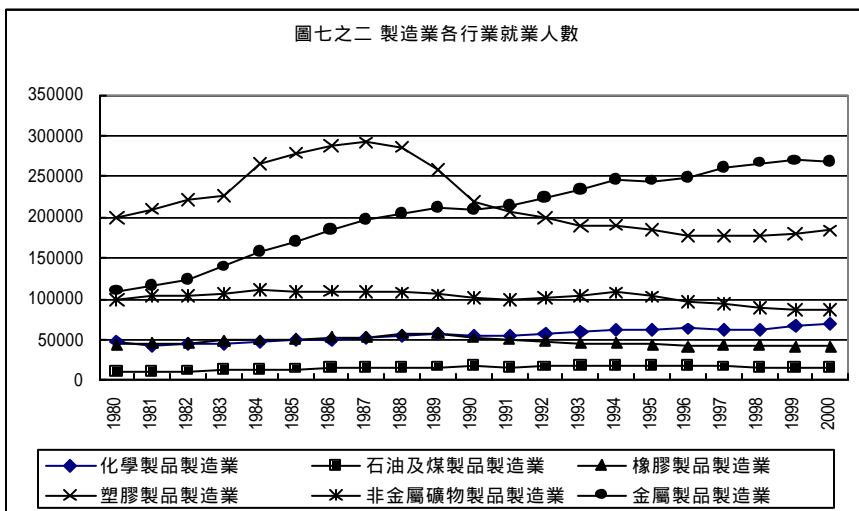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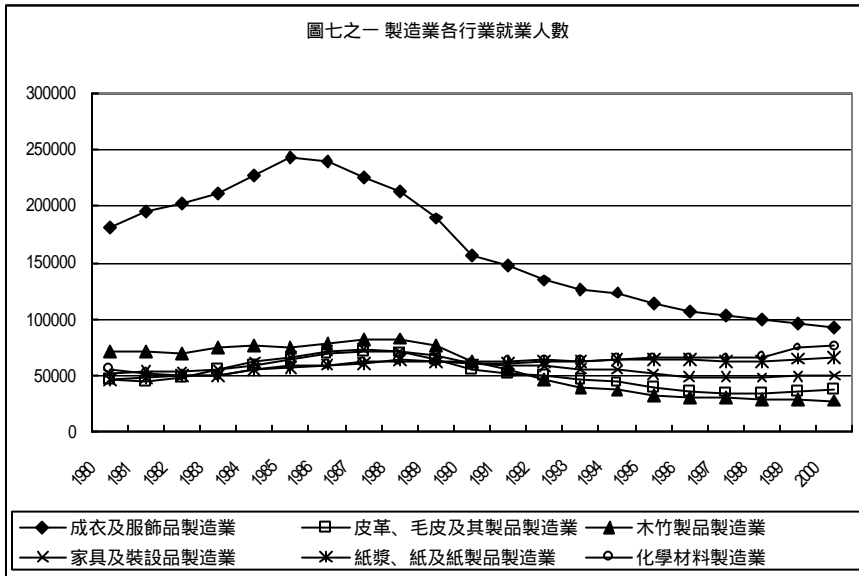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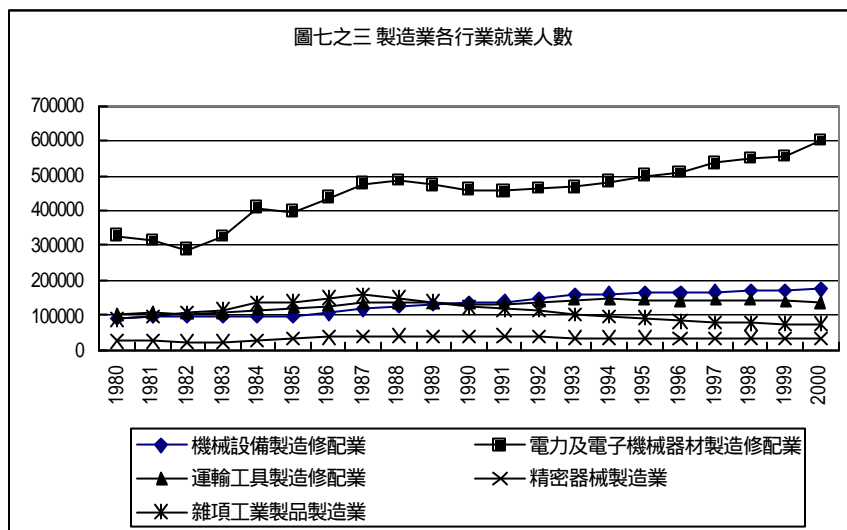
圖五 製造業中不同低度就業類型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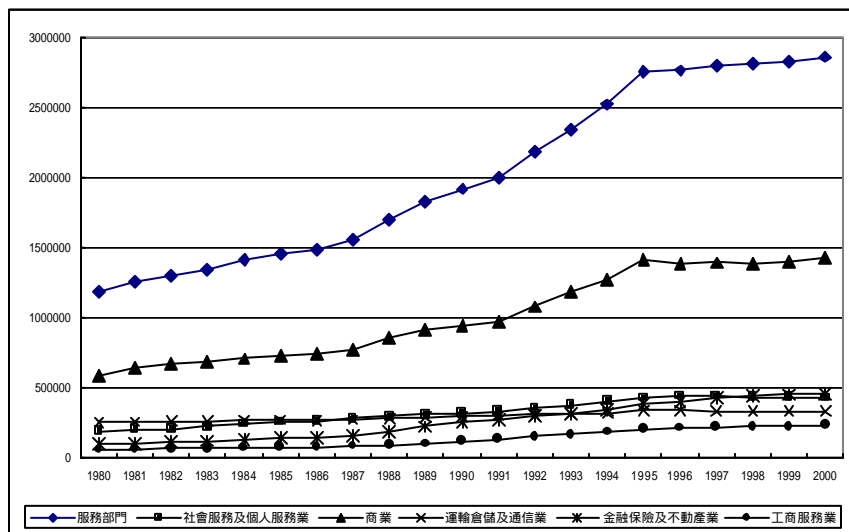
圖六 服務業中不同低度就業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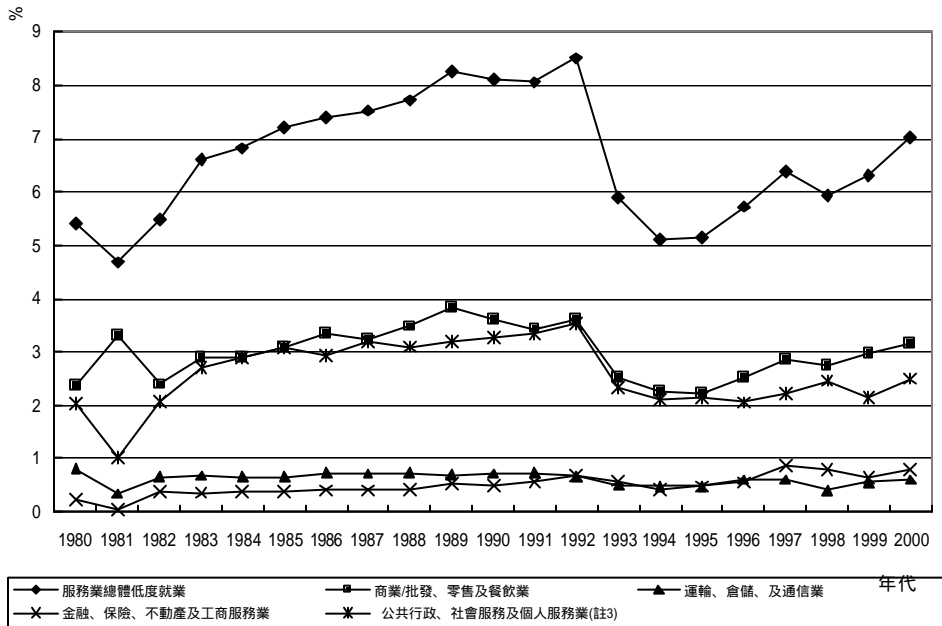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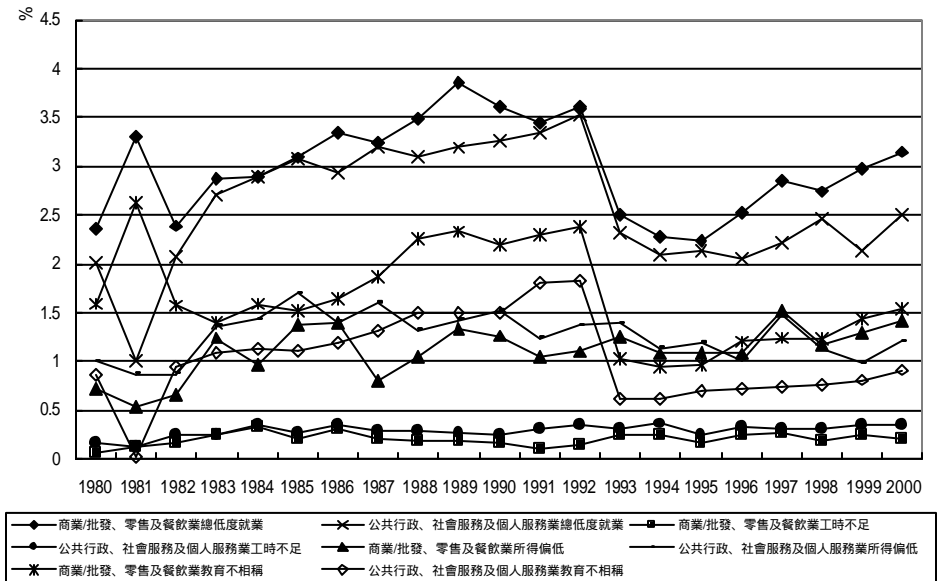
圖八 服務業各行業就業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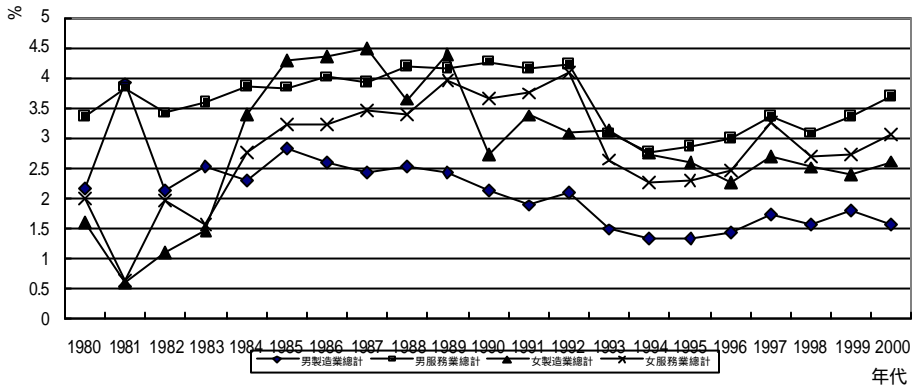
圖九 服務業各行業間之低度就業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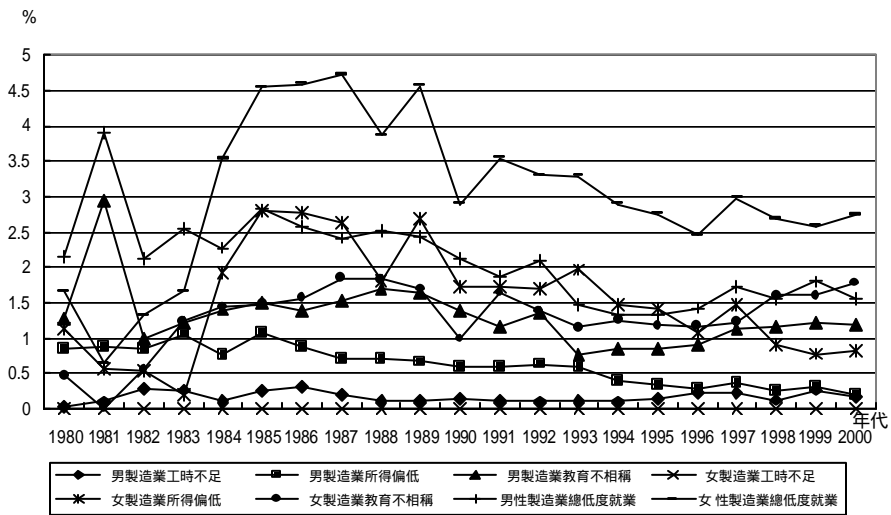
圖十 商業/批發零售餐飲業與公共行政社會個人服務業中低度就業類型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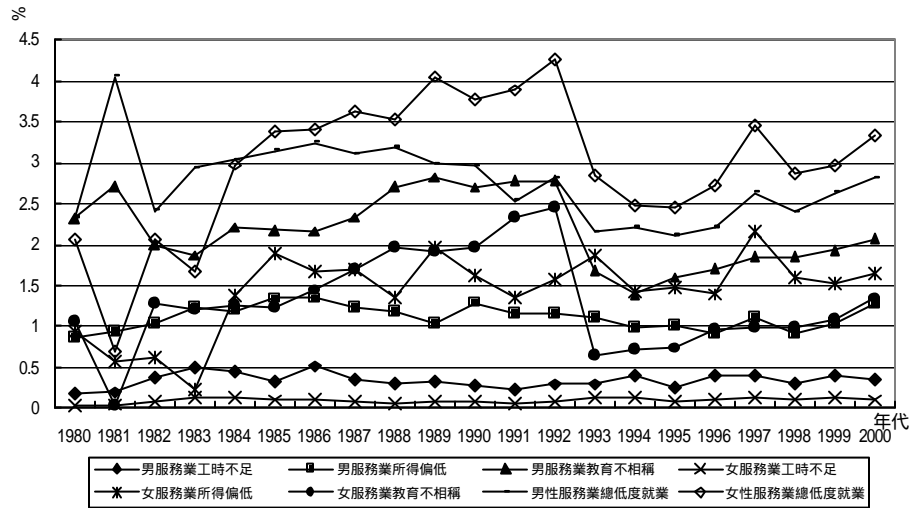
圖十一 製造業與服務業中男女低度就業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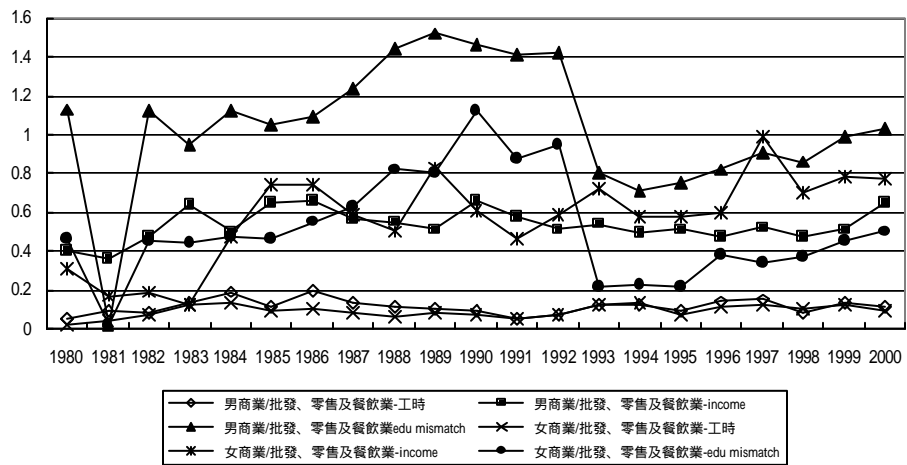
圖十二 製造業中男女在各類型低度就業之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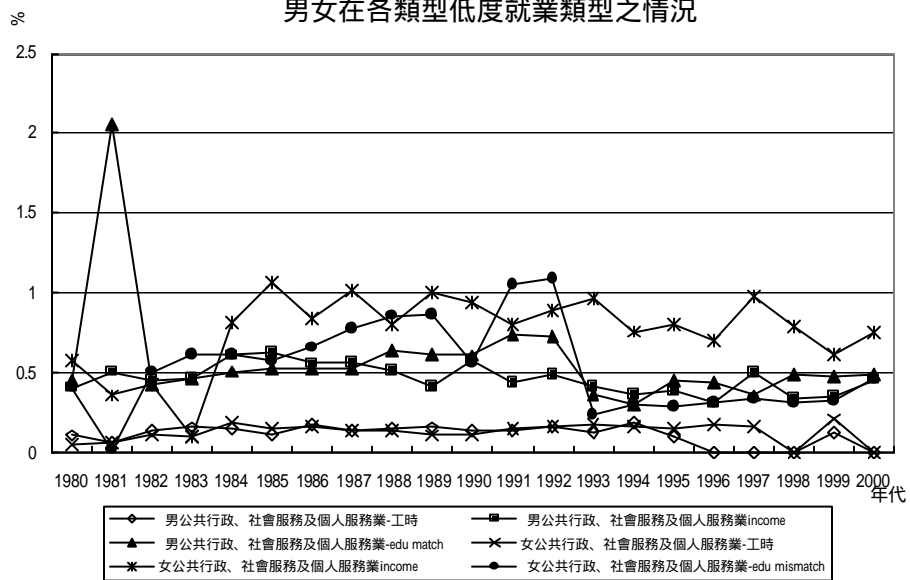
圖十三 服務業中男女在各類型低度就業之情況



圖十四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中男女在各類型低度就業之情況



圖十五 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中
男女在各類型低度就業類型之情況



Labor market in the move: The underemployme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in Taiwan

Huang Kuang-Ying

You Yu-Qing

Li Meng-Hao

Yuan-Z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Informatics

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recognized to bring out the change of the producti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work. However, many scholars had pessimistically argued that its development will increase job mismatch and polarize the labor market. (This study used a second hand data from The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results suggest, in the manufacture sector, there is an obvious trend of moving abroad to get cheaper labor.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 increase of low-pay, low-skilled work is found. In general, this study found that female workers did not benefit from the new technological paradigm.

Keyword : Information Society, Labor market, Underemployment